

浙江名人研究大系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主编 万斌

天地一客

——
谢灵运传

宋红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天地一客

谢灵运传

宋红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地一客:谢灵运传 /宋红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7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万斌主编)

ISBN 7-213-03080-9

I. 天... II. 宋... III. 谢灵运(385~433) -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848 号

天地一客——谢灵运传

宋 红 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176516
- 责任编辑 王福群
- 责任校对 叶 宇
- 封面设计 池长尧 殷 瞻
-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 印 张 10.25 插 页 2
- 字 数 23.3 万
-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3080-9
- 定 价 2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撰指导委员会

顾 问:梁平波 盛昌黎 刘 枫 毛昭晰

主 任:陈敏尔

副主任:童芍素 沈立江 万 斌(常务)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 斌 王凤贤 杨仁山 杨金荣 何一峰
谷迎春 沈立江 沈善洪 陈 铭 陈敏尔
钱巨炎 徐海荣 黄亚洲 童芍素 韩李敏
蓝蔚青 廖可斌 魏 桥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万 斌

副 主 编:卢敦基(常务) 陈 铭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 斌 王志邦 卢敦基 任宜敏 吴 光
汪俊昌 陈 野 陈 铭 林华东 罗卫东
徐 晓 徐吉军 郭浴阳 程小澜 曾 骅
楼贤俊 滕 复

总 序

万 斌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

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期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顗、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

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 20 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 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前 言

朱光潜先生在《自然美与自然丑》一文中引述了这样两个小故事：

法国画家卢梭有一次在山里临摹一棵大橡树，一个过路的乡下人问他在干什么，他很诧异地说：“你分明看见，我是在临摹那棵大橡树呀！”那位乡下人仍是莫名其妙，继续问他：“那有什么用呢？橡树不是已经长在那儿么？”

波斯一位画家画了一条鱼，自己很得意。一个乡下人看到，颇不以为然，“上帝造鱼都给它一条性命，你给它一个身体，不给它性命，这不是造孽么？”

这两则故事说明，人对自然的认识 and 把握是有阶段性的。尽管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看，模仿永远赶不上生活的真实；从艺术的角度看，单纯模仿自然也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然而从历史发展、艺术发展的角度看，将空间形式的自然世界在时间形式的诗歌中表现出来，将三维空间在二维平面上表现出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人对自然的一种掌握，是艺术发展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晋宋时代便是这样一个开始用时间艺术、平面艺术再现自

然的时代。

谢灵运作为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人生道路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思想折光。为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作传，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谢灵运(385—433)出身名门，祖父谢玄是东晋名将，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神话。他本人少年早慧，博学多才，“自谓才能宜参权要”。然而生逢晋宋易代之际，旧朝贵族的身份及张扬性格，加之“才有余而识不足”^①的个人素质，决定了他在刘宋王朝艰难的政治处境。

仕途上，谢灵运三次搭错车。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东晋王朝摇摇欲坠时的混乱局面——

简文帝之子晋孝武帝司马昌明晚年耽于酒色，委国政于宰相自己的胞弟司马道子(二人同为李夫人所生)。孝武帝为张贵人闷杀后，太子德宗即位，史称安帝。德宗是个智障白痴，全靠胞弟德文从旁节度。

司马道子专权，国舅爷王恭(其妹为孝武帝所立皇后)曾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联手，起兵清君侧。世居荆州的桓温庶出之子桓玄因风借力，亦劝殷仲堪起兵。后桓玄又攻殷仲堪，讨伐司马道子之子元显，招降曾为谢玄部将的刘牢之和刘牢之的部将刘裕，终于篡晋。

被夺了兵权的刘牢之想起兵讨伐桓玄，参军刘袭说：“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将军往年反王兖州(王恭)，近日反司马郎君(元显)，今复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②刘牢之最后自缢

① 释僧苞评语，见《法苑珠林》卷四七《感应缘》“宋沙门释僧苞”条。

② 《资治通鉴·晋纪》“安帝元兴元年”条，第3540页。

身亡。

刘裕、刘毅等在京口起兵讨桓，桓玄挟持晋室安帝等逃往荆州老巢，兵败被杀。安帝复位。

——谢灵运在安帝复位之际入仕，与堂兄谢瞻、堂弟谢弘微一同做了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和大司马参军。琅邪王便是安帝的胞弟司马德文。以德文的特殊身份，谢灵运步入仕途的起点应该说是很高的。此事想必是族叔、孝武帝佳婿谢混的安排。然而晋祚不永，刘裕于义熙十四年(418)杀安帝，立其弟司马德文，史称恭帝。恭帝于一年半以后逊位，又一年后于永初二年(421)被杀。这是谢灵运第一次搭错车。

安帝复位后，刘裕、刘毅之间争夺权位的矛盾日渐激化。大约因为旧臣曾经有以谢混为扬州刺史阻挡刘裕入朝的谋划，所以刘裕入朝后谢灵运离开朝廷，由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转为刘毅的记室参军(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又升为卫军从事中郎。这是谢灵运第二次搭错车。义熙八年(412)，刘裕讨伐刘毅，毅兵败自杀后又斩首，谢混作为毅党中人被赐死，谢灵运被收编，不尴不尬地成了刘裕的太尉参军。

此后谢灵运转到世子刘义符帐下，任世子左卫率，曾因怒杀门人桂兴而一度免官。刘义符是酒色之徒，刘裕对他并不满意。谢灵运、颜延之、慧琳与刘裕的二儿子庐陵王刘义真关系款密。这是他第三次搭错车。在废立太子之议中，虽也考虑过义真，但终作罢论。刘裕死后，徐羨之等专权，将少帝义符废而杀之，又杀了已废为庶人的刘义真，最终立三子义隆为帝，史称文帝。

谢灵运入宋后虽身历武帝、少帝、文帝三朝，但或放外任为永嘉太守、临川内史，或闲居会稽始宁老宅，或入京为文学侍臣，始终没有得到信任。这使他非常痛苦和失望，便以优游山水来

排遣心中的郁闷,同时也以此表示对刘宋王朝的抗议。其游览中的记景抒怀之作,便是摹山范水的山水诗。“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排。”谢灵运无意之间成了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山始祖。正如白居易《读谢灵运诗》中所说:“谢公才落廓,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需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协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木。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

谢灵运的郁积之气所以会“泄为山水诗”,因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已与自然界建立了一种审美的关系。魏晋时代,是人与自然之审美关系开始形成的时代。这时人不仅用发现了自然美的眼睛看自然,而且用这双眼睛去“发现”其他事物。诸如以山水论容貌:《世说新语·排调》:“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导)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以自然现象喻人资质:《世说新语·言语》:“顾悦与简文帝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凌霜犹茂’”;以自然景观论作家风格:梁钟嵘《诗品》曰:“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应该看到,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与其所处时代的自然审美意识有着极为密切的血脉关系,所以为其作传时有意识地吸纳了一些当时人关于山水的名谈。

对于六朝自然审美意识的形成,魏晋玄学和东晋以后大为流行的佛学思想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在通过自然“悟道”、“悟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山水自然本身的美。随着思想界由哲学型自然观到审美型自然观的转变,文学界实现了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正处于这种文学转型期的谢诗,在描写山水的诗篇中往往会以两句表现玄言哲理的诗句作为结束。而谢灵运本人,不仅是“文章之美,江左莫逮”的文学家,而且有着很

深的佛学造诣。他认为儒家经典是用来济世的,佛家经典才能提高自身修养^①。从现有资料看,他是中国谈及古印度佉卢文的第一人,也是懂梵文的第一位中国诗人;而他在“顿渐之辩”中对佛家新兴之顿悟说的阐释,不仅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流波后世。至唐代,顿悟说成为影响一代文学创作与思想方法的重要哲学概念,其内涵已远于竺道生的首倡而更接近谢灵运的阐发意义。因此,本传特辟“辩论宗义”一章,以揭示那场意义深远的哲学讨论,并力图从不同侧面展现谢灵运的学养及其在上流文化圈的地位。

梁代刘勰于《文心雕龙·明诗》篇论述刘宋文学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又于《物色》篇中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这两段话,正可概括谢灵运诗文的特点。“极貌以写物”,“如印之印泥”,“曲写毫芥”,便是白居易所说的“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木”,所表现的是一种全景山水。他的诗往往从驱车出游起笔,一路景色“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形成散点透视的长卷式构图和游记式的叙述结构。与之相通的是:早于谢灵运 40 年的顾恺之所画《云台山图》,也同样表现出全景式的构图。此画迹已经不存,但从顾自作的《画云台山记》中我们仍可看出图画的大致面貌。刘宋人宗炳《画山水序》对当时绘画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亦是:“竖画三寸,当千仞之

① 宋何尚之《列叙元嘉赞扬佛教事》记文帝元嘉中言论曰:“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全宋文》卷二八)

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将“昆仑山之大围于寸眸”。绘画中这种闭锁式的全景山水，与六朝以后选取局部的开放式山水及南宋出现的边角山水有着层次上的不同，如北宋郭熙、郭思父子即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发表了与宗炳完全不同的看法：“千里之山，不能尽奇；万里之水，岂能尽秀……一概画之，版图何异！”——纵向观之，人对客观外物的把握在不断提升和深化；横向观之，在同一意识形态中，各种艺术门类的表现方式是相通的，共同反映着那一时代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水平。因此，本传刻意描述了山水画始祖顾恺之、田园诗始祖陶渊明，及新文体写作者宗炳（画论写作）、袁山松（山水志记写作）、刘义庆（志人笔记写作）等一批相关人物的相关活动，力图在一个完整的社会关系网中展现谢灵运。

六朝史料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鲜活生动，语吻毕显；二是零章断简，不成片段。如宋人刘义庆的志人笔记《世说新语》，保存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但往往背景模糊，因此利用资料时哀集一处容易，贯穿成串很难。加之已有六种谢灵运年谱存世，再用排比史料的方法写传，很容易落入年谱长编的老套，使人物形象单线平图，难得丰满，亦辜负了史料的鲜活特性。根据丛书编委会的要求和本人对传记写作的体会，本书在评传、史传之外采取了文学传的写作方式，即采用叙述、描写性的语言，将史料放在时间的流动中来展现，追求事件的完整与连贯。同时，遵循言必有据的原则，以确保传记在学术上的真实性、严谨性与开创性。

以文学笔法传写历史人物，当以台湾作家林语堂所作之《苏东坡传》为个中翘楚。林先生不无得意地说，他的文字可谓句句有来历。原来他的“来历”便是清人王文诰所撰的《苏文忠公诗

编注集成总案》。这“总案”有如一个年谱长编，将苏老先生方方面面的社会活动、朋友往来都编集在一处。以此为依托，林先生作传时必是游刃有余，所向砉然。

为谢灵运作传，没有一部“总案”可资依凭，这便更富有挑战性。史料的钩沉取舍、考索辨析，往往需要花费很多的心力。此书虽是一气呵成，但准备材料、拟订提纲，积下的草稿纸，也有几十页。其中仅谢灵运留居地的行踪位置草图便画了五张，包括永嘉、始宁、建康、庐山、临川五地。恰如左思在《三都赋序》中所说：“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将严谨的资料考据，化作丰满的叙述和描写，“还历史一种真实”，窃以为这便是用文学笔法写历史人物传记的魅力所在和窍门所在。

当然还有一些史实本身即含混不清或存在异说，如谢惠连的寿数，今本《南史》、《宋书》作37岁，而《文选·雪赋》注引《宋书》作“年二十七卒”；本书提到的秋当，一作“狄当”；宗齐受一作“宋齐受”；王淮之一作“王准之”。诸如此类，前人有辨析的，择其“言之成理”者而从之，无关宏旨者，择一而从，不再重复前人的见解，亦不一一出注。本书所引诗文，除关涉文义的重要版本异同外，通常择善而从，并不逐一辨析和校勘。

书中谢灵运的言谈举止，或依史料明载，或由谢灵运的诗文推排演化，尽量做到合情合理。另有一些因果关系并不显豁的史料，则从逻辑上加以勾连。如谢惠连“幼有奇才”，为什么见知于灵运而“不为父方明所知”？表面原因是灵运爱才，但谢方明就不爱才吗？即便他不知惠连是才，难道就没有爱子之心吗？在谢灵运传中，这是个疑点，但在谢惠连传中却可找到答案：因为谢惠连正与父亲谢方明手下的小吏闹同性恋，这自然会使得做着会稽太守的谢方明极为难堪。这才是父子失和的直接原因。

将相关人物的材料对读,对同一时段的不同资料加以比照和爬梳,才能得出更为丰满、更近真实的认知结论。所以说,读书治学,有两句古训不得偏废:1. 开卷有益;2. 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追求记述的真实、准确与鲜活,本人特于2004年3、4月间前往江、浙两省进行实地考察,踏寻谢灵运遗踪。足迹及于温州(永嘉)、绍兴(会稽)、上虞(始宁)、嵊州、金华(东阳)、梅城、桐庐、杭州(钱唐)、南京(建康)等九地,水陆并举,舟车相继,历时15天,拍摄图片近千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得到各地旧雨新知的大力支持。田野调查的艰辛与收获,友朋相待的高谊与温润,俱已融入传记的字里行间。我愿以一份满意的答卷向给予我极大帮助的各方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坦白说,虽然致力于山水文学多年,但对于谢灵运这位山水文学的鼻祖却并无多少好尚。尽管他博学多才,聪颖过人,但急功近利,褊狭而又张狂,全无苏东坡那般“行于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得止”的处世智慧和练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兼有唐人之豪放、宋人之睿智以及个性之幽默的苏东坡,才是封建时代中国士人之极致。但谢灵运毕竟是中国山水文学流变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因而我萌生了为之作传的念头。感谢浙江省社科院、“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委会提供机会,感谢从叶瑛到顾绍柏六位谢灵运年谱作者提供按图索骥的线索,使我终于完成了为谢灵运作传的心愿。作传,使我在一个新的层面上走近了谢灵运。

文学史上,有两个人和谢灵运非常接近。可以这样说:谢灵运的前身是陈思王曹植;谢灵运的后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钟嵘《诗品》称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李白又在《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诗中宣称:“故人赠我我不违,着令‘山水含清晖’。顿惊谢康乐,诗兴生我衣。襟前‘林壑敛暝色’,袖上‘云霞收夕霏’。”

这三人都政治抱负极高的人，但实际上并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以一颗赤子之心面世，难免不处处碰壁。而正是碰壁的苦闷，才涵养出他们的好诗来。

谢灵运以谋逆之罪被杀，研究者多以为灵运见诬，政治家则以为灵运确是谋反无疑。顾炎武《日知录》“文辞欺人”条曰：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如谢灵运，次则王维。灵运身为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宋氏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既为宋臣，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至元嘉之际，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唯以高义接之，以致缺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诗曰：“韩亡子房奋……”及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若谓欲效忠于晋者，何先后之矛盾乎？史臣书之以逆，不为苛矣。

毛泽东读《古诗源》，对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作批语曰：

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①

恐怕还是政治家的眼睛更锐利一些。灵运是那种冲冠一怒，拍案而起的人，没有那么多的城府，也不懂什么机诈权谋，从怒杀门人到兴兵拒捕，其思想脉络是连续一贯的，这才是有血有肉的

^①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